

依附關係、參與傳統活動、社會緊張因素與台灣地區青少年外向性偏差行為及內向性偏差行為關聯性之研究

譚子文 范書菁

摘 要

本研究主要依據社會控制理論及一般化緊張理論的觀點，探討依附關係、參與傳統活動及社會緊張因素，和台灣地區青少年外向性及內向性偏差行為的關聯性。以「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2005 年下半年第三波調查之高中學生為對象進行研究(N=10,658)，並運用巢式迴歸分析進行資料處理。本研究發現：(一) 相同的影響因子對於外向性及內向性偏差行為的影響具有差異性；(二) 一般緊張理論較社會控制理論更能夠解釋台灣青少年偏差行為問題，且更適宜解釋外向性偏差行為；(三) 男性青少年較容易發生外向性偏差行為，女性青少年則容易發生內向性偏差行為。依據研究的分析結果，文中就未來對青少年偏差行為之研究與輔導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依附關係、參與傳統活動、社會緊張因素、偏差行為、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

譚子文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通訊作者，tantzyywen@hotmail.com）

范書菁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

緒 論

高中階段的青少年特色，除了積極追求自主和獨立之外，認知和問題處理的能力也會隨著年齡成長隨之改善，但是囿於心智的發展尚未臻成熟穩定，以致於在成長過程中，既要面對來自學業競爭與升學考試的壓力，又要調適來自家庭、社會、學校、同儕、自我發展等的壓力或挫折，往往就會因此引發各類型的偏差及犯罪行為。青少年的行為會因人、事、時、地、物的不同，而表現出不同類型的偏差行為，例如外向性及內向性偏差行為。在以往有關青少年外向性偏差行為之研究，大都側重如逃家、與父母發生衝突、深夜在外遊蕩、賭博、吸煙、打架與他人發生性關係等違反社會、家庭、學校中的法律或紀律之偏差行為探討（如 Huebner & Betts, 2002; Magoon & Gary, 2006; Parker & Benson, 2004; Vachon, Frank, Brigitte, & Richard, 2004）。內向性行為問題方面，檢視以往的研究大都焦點在國高中生之內在自我控制或自我韌性（謝曜任，2005；Huey & Weisz, 1997; Robins, John, Caspi, Moffitt, & Stouthamer-Loeber, 1996）；心理調適不佳、心理苦惱（Herrero, Estevez, & Musitu, 2006）；負向生活事件與自殺危險行為（Park, Schepp, Jang, & Koo, 2006; Wilburn & Smith, 2005）等面向進行研究。然而行為偏差的情形，除了遺傳因素外，生活環境及家庭、同儕、學校、社會的不良因子以及學生個體本身生理、心理、社會的互動歷程，都足以形成影響青少年行為問題的界定。但是對於青少年外向性及內向性偏差行為成因的影響因子是否有其一致性，以及同樣的影響因素對於外向性及內向性偏差行為的影響有無差異性，在以往的研究中尚難見此方面的探討。

青少年偏差行為係一種錯綜複雜的現象，非單一因素所能夠完全解釋。因此，如何預防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發生，已成為一重要的研究

課題與使命。在討論如何有效防止青少年偏差及犯罪行為的發生之前，首先要瞭解其形成的原因及過程。而一個兼具完整性及多元性的理論架構，是有助於教育學者、心理學者、社會學者，及犯罪學者探求助長或防止偏差行為發生的原因或事件（許春金、孟維德，1997）。近年來已有系統地結合不同的理論，討論偏差及犯罪行為的產生過程已成為犯罪理論發展的重要趨向，即以綜合或整合性的觀點解釋偏差及犯罪行為的形成過程（蔡德輝、楊士隆，2006；Akers & Sellers, 2009）。誠如 Thornberry(1997)指出，以發展性與多元化的觀點解釋偏差及犯罪行為的形成，才能拾回偏差行為理論的完整性及實際性。檢閱相關文獻，研究者認為 Hirschi(1969)的社會控制理論(Social Bond)及 Agnew(1992)一般化緊張理論(General Strain Theory)不僅可說明各種偏差行為的產生，同樣也可提供一個較適切及完整的解釋。因此本研究將以社會控制理論及一般化緊張理論為基礎，藉由實徵資料與理論模式比較，以更為統整的角度瞭解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因素。基於此，本文之主要研究目的在於：

- 一、探討與驗證社會控制理論及一般化緊張理論對解釋台灣青少年偏差行為發生的啟示與適當性，以及此一整合性理論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發生機制的詮釋。
- 二、檢驗同樣的影響因子對於青少年外向性及內向性偏差行為的影響是否有差異性。
- 三、藉由這些討論提供相關學者及有關單位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發生的新思維模式，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作為未來研究與學校輔導工作的實務參考。

文獻探討

一、偏差行為之意涵

吳武典（1992）認為所謂偏差行為，就是個人的行為顯著地偏離常態，並且妨礙其生活適應者。簡單地說，即是行為需同時具備「有

異」及「有害」兩個要件，才足以符合偏差行為的定義。意指若行為只是和社會常態不一樣，雖然與一般人不同，尚不能斷定其行為偏差，因為這項行為並沒有造成自己的不健康或不利，也沒有對他人帶來痛苦或社會危害。陳羿足、董旭英（2002）則將偏差行為定義為「違反任何團體規範之行為」。如同上述文獻所探討的，我們必須將行為與社會整體相較，才能進一步判斷其是否為偏差行為。那麼，在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時空，則有不同的標準，對於偏差行為的界定當然也會有所不同。所以，偏差行為並沒有所謂「絕對偏差」的觀點(the absolutist definition)，偏差行為既是由社會規範所界定，而對認可或排斥之規範本身，會因時間與空間的移轉，以及不同社會、文化或情境而轉變。

眾多的學者在探討青少年偏差行為時，皆將偏差行為加以分類，不同學者所採用的分類方式並不一致，但大體上可化約成「外向性行為問題」、「內向性行為問題」及「學業適應問題」等三類(林朝夫, 1995; Barnett, Miller-Perrin, & Perrin, 1997)。任何偏差行為的發生，都有其原因與相關背景。因此，探究偏差行為的成因，進一步深入瞭解其特徵與本質，將有助於對偏差行為的預測、評估及輔導(吳武典, 1995)。青少年的偏差行為可能和許多個人脈絡的特徵有關，如父母、學校和同儕，個人脈絡的不同對偏差行為的影響程度亦有所差異(黃德祥, 2008)。有些偏差行為同時涉及外向性與內向性問題，例如 Hirschi(1969)強調依附母親、同儕將有效減少青少年的外向性偏差為，但是來自於母親的心理控制反而會加重青少年的內向性偏差行為，如憂鬱程度(Garber, Robinson, & Valentiner, 1997)，而同儕依附程度較差的青少年亦容易有偏差行為的發生及憂鬱感(Gjerde, 1995; King, Akiyama, & Elling, 1996)。同時亦有研究指出，憂鬱情緒與攻擊行為常常共同出現在青少年身上(Cicchetti & Toth, 1988; Rudolph & Clark, 2001)。由此觀之，青少年發展脈絡中的某些關鍵因子，同時

會影響外向性及內向性偏差行為的發生。換言之，任何一種外向性偏差行為是有可能會與內向性偏差行為併發的。

對於偏差行為的定義，本研究採用陳景圓、董旭英（2006）對外向性偏差行為所定義之內涵：外向性偏差行為是指個體所表現出來的外在行為，而這些行為主要是違反法律或社會上的文化規範。因而本研究將偏差行為定義為一程度性及多向性行為的整體表現，例如蹺課、逃學、喝酒、和老師起衝突、偷竊、吸毒、抽煙、和別人打架等。而內向性行為問題包含與家人負面關係、負向生活事件、生活焦慮及疏離感，其具體行為則可能涵蓋畏縮、消極、不合群、不敢表示意見、過度依賴、做白日夢、焦慮反應、敵意反應、自傷、自殺行為等(林朝夫, 1995; Coleman, 1996)。任何內向性偏差行為皆可視為內化適應困難的症狀，當個人遭遇困難或生活挫折，無法以自己的能力、經驗去克服，或無法改變自己的行為模式去因應環境的需求時，便可能訴諸不適當的行為作為反應策略，以滿足需要或解除危機。

二、社會控制理論(Social Bonds)依附與參與要素

Hirschi(1969)所提出的社會控制理論認為，個人只要與某些傳統社會的連結愈緊密，便會與其他型式或種類的社會連結愈緊密。這種促使個人順從社會規範而不致犯罪的社會連結(social bonds)，包括依附(attachment)、抱負(commitment)、信念(belief)及參與(involvement)等四個要素。而所謂的依附是指我們和他人有親密的感情、尊敬他們以及認同他們，進而我們在意他人的期待。因此，愈依附於父母、學校、同儕團體及傳統社會，愈不可能犯罪。其次，抱負對於偏差行為的影響，主要是由於偏差行為可能會使個人喪失努力的成果、就學與就業機會、甚至於美好的未來，故抱負會使個人避免違反規則。第三，信念係指合於道德且應該遵行的一般法律和社會秩序，因而個人對社會規範的信念愈強，愈不會違反規則，也就

愈不會發生偏差行為。最後，參與是指個人將時間、精力投入於傳統活動的程度，其假設是參與傳統活動的程度愈高，愈有明顯遏阻偏差行為發生的功用。

Wiatrowski 與 Anderson(1987)針對 Hirschi 的社會控制理論提出一個觀點，社會控制理論大都是針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研究，而且「依附」是相關實徵研究中使用次數最多的一個社會控制理論要素。若再從青少年成長的過程與發展角度審視，伴隨著青少年成長的父母、學校以及與同儕團體之間的依附關係，顯然地比其他三個社會連結來得重要 (Costello & Paul, 1999)，主要原因在於依附父母、學校及同儕團體不僅是奠定青少年健全人格發展及其適當社會化之重要機構，亦顯示社會控制理論事實上是一個社會化理論 (周憐嫻、曹立群, 2007)。因為個人與社會的連結最初必然是建構在「依附」，而後才會發展出其他各種類型的社會連結。Hirschi 並進一步指出依附與其他三個要素之間是呈現正相關關係，亦即青少年若能以依附與傳統的社會機構連結，愈可能透過其他的鍵與其他社會機構相連結。簡言之，當青少年和重要他人有緊密的感情繫屬、尊敬及認同他們，青少年才會在意他人的期待，進而愈可能建立符合他人期待的高遠抱負，亦愈可能投入時間及精力參與合於他人期待及觀感的傳統社會活動 (Longshore, Chang, & Messina, 2005)。

雖然社會控制理論要素被驗證的方式眾多 (侯崇文, 2001; 劉梅真、黃鈺婷、張明宣、吳齊殷, 2006; Agnew, 1991; Cretacci, 2003; Krohn & Massey, 1980; Matsueda, 1989)。但觀察發現，Hirschi 的社會控制理論，僅是分別說明各要素與偏差行為之間的關係，並未清楚討論四個社會連結的結構及次序性關係 (譚子文, 2009)，Krohn 與 Massey 就曾指出他們之間有重疊，甚至混淆不清之處 (陳玉書, 1988; Krohn & Massey, 1980)。對於該項理論的整體性解釋能力，Hirschi 雖然也曾利用少許篇幅來說明四種社會連結要素之間的相互關係 (Hirschi, 1969)，但 Hirschi 在他的理論中並沒

有對諸要素之綜合預測能力的說明。尤其在以往的研究甚少有針對「依附」及「參與」要素關聯性的探討，特別是「參與」要素是社會控制理論四個要素中最少被實徵研究所檢驗，且常被選擇性忽略的變項 (Kempf, 1993)。侯崇文 (2001) 則認為信念因關係到社會的規範或價值觀，是社會秩序的基礎，信念與偏差行為的關聯無庸置疑。Matsueda(1989)的實徵研究亦指出，傳統價值信念薄弱對少年犯罪的影響很小；Agnew(1991)的研究顯示，抱負與較輕微的青少年偏差行為僅有很微弱的關係。因此，本研究試圖提出一較完整與系統化之「依附」及「參與」要素架構，探究二者與青少年偏差行為間的關聯性，以下分別就社會控制理論中的依附關係、參與傳統活動相關文獻提出討論。

(一) 依附關係(attachment)

Hirschi(1969)強調依附是社會控制理論的「感情」(affective)要素，當青少年與傳統他人 (如：父母、朋友、教師) 建立親密關係時，欽佩景仰他們，在乎他們對自己的意見，也就愈害怕喪失摯愛或親愛之人對他的好評語 (good opinion)，即所謂對他人看法的敏感性 (sensitivity)。而多數他人的期許和看法又可被視為社會規範，社會規範為多數的社會成員所共享。因此，個人與他人的依附性愈高，其內化社會規範的程度也可能愈高。反之，當我們對他人的意見愈遲鈍，越不在乎他人的期望與看法，即對他人不具敏感性 (insensitivity)，則我們愈不會受彼此共有的規範所拘束，我們愈可能去破壞規範 (Akers & Sellers, 2009)。若再從依附關係與心理需求之關係來審視，依附關係與心理需求的滿足狀況有關。依附關係形成於個人幼年跟照顧者之互動品質，互動品質決定於照顧者對受照顧者需求之敏感性 (陳金定, 2008)。以下茲將青少年人際交往中最重要他人：父母、學校及同儕之依附關係主要概念說明如下：

1. 依附家庭

許多實徵研究指出，家庭因素當中的親子

關係、家庭溝通不良、家庭氣氛冷漠、低社會階層、家庭規則不足、家庭結構不完整，及父母親職角色與親職功能低落等等，都會影響青少年的偏差或犯罪行為（陳麗文，2000；鄭瑞隆，2008；Magoon & Gary, 2006; Vachon et al., 2004）。個體基本生理需求與情愛、隸屬和安全等心理需求均經由家庭生活而得到滿足，所以家庭生活中青少年與其父母互動中所形成的親子關係對青少年的人格以及行為，具有深遠的影響(Paley, Conger, & Harold, 2000)。Hirschi強調依附父母的主要內涵，在於青少年和父母之間溝通愈良好、情感愈認同，即表示其對父母的依附程度愈強，這是由於愈依附父母，愈會模仿和認同父母的價值信念及言行舉止。此種親子間的安全依附關係有助於子女的自尊、生活適應、因應壓力能力的成長，其攻擊行為、憂鬱傾向、自殺傾向較低，受挫時較不會有情緒困擾(McCarthy, Moller, & Fouladi, 2001)。李文傑、吳齊殷（2004）的研究則指出，若再能將父母與青少年間的連結區分為父子關係及母子關係應是較為合理的。

2. 依附學校

個體在社會化過程中主要接觸的兩大機構是家庭及學校（陳景圓、董旭英，2006），但就一個社會化機構的角度來看，學校可能比家庭更具有優勢，也更能夠有效地監督行為，因為孩子在學校可以普遍受到老師的監督，老師比家長較容易認知孩子的偏差行為。與家庭相同，學校在理論上擁有懲罰偏差行為的權利和方法(Gottfredson & Hirschi, 1990)，比家庭具有更明確維護紀律與秩序的動機，這對於偏差行為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在各種學校因素中，對青少年的偏差行為造成影響的有青少年的學術能力（許春金，1986）及課業壓力(Garmezy & Rutter, 1983)，學校過度強調升學導向因素（周榛嫻，2001），師生關係（侯崇文，1996）、教育疏離感(Blumenkrantz & Tapp, 1977)，個人對於學校的喜歡與附著程度（許春金、馬傳鎮，1997）。因此青少年在學校課業、行為表現的優劣、師生之間的互動以及因此而建立的依附關

係，勢將影響到偏差行為發生的可能性(Le, Monfared, & Stockdale, 2005; Murray & Greenberg, 2000)。易言之，青少年與學校之間的依附關係，意涵著學校對學生的社會控制，而其控制的強度也將影響到個人的行為表現。

3. 依附同儕

Hirschi(1969)認為孩子愈依附於同儕團體時，愈尊敬或崇拜朋友的言行和談吐，此時孩子也愈可能依附於父母，因而愈不可能從事偏差或違法行為，同儕彼此之間會透過活動參與發生相互影響。Hirschi強調兩個概念，即對同儕的依附性及由依附而產生的順從性，前者正如依附家庭、學校一般，具有一定的社會控制力，而後者則可能是因為考慮同儕對自己有關行為的意見，進而能夠降低或減緩犯罪或偏差行為的發生（陳玉書，2000）。良好的同儕關係、優秀的學校表現、社團活動的參與等，對青少年均有正向的幫助，若在學校中有太多負面經驗，則會導致對學校的疏離感、增加和行為偏差同儕的互動，並因而形成偏差行為(Hoge, Andrews, & Leschied, 1996)。可見青少年除了與同儕之間依附關係的維持外，還會因接觸不同類型的朋友而對偏差行為產生不同的影響力，當然這其中可能涉及到同儕的價值觀差異所致，因此對同儕的依附程度以及同儕的價值觀取向都可能是影響少年偏差行為的重要因素。

（二）參與(involverment)

參與是社會控制理論的「時間」(temporal)要素，通常是用來衡量青少年花費多少時間在家庭作業、傳統工作、宗教服務或傳統的課外活動上，參加程度的不同直接影響青少年的行為模式。社會控制理論認為「邪惡生於懶人之手」(idles hands are the devils workshop)，當個人將其有限的時間與精力投入傳統活動(conventional activities)，如：學術活動、康樂活動、運動及正當的休閒活動等，藉著時間的消耗、工作、運動、娛樂、嗜好及參與各種活動的推展，將能有效的阻絕青少年產生偏差行

為之機會。Hosley 和 Montemayor(1997)整理眾多學者在不同時期所做的不同研究結果均顯示，青春期的孩子比年幼時花較少的時間與雙親相處，原因除了同儕傾向與要求自主之外，並與渴望從事校外活動有關。又由於青少年正處於自我認同重要階段，並且同時面臨因青春期的生、心理與社會角色轉變(Pillari, 1998)。故適當的參與傳統休閒活動能夠提供青少年體驗不同生活角色，並有助於化解生活中壓力(Leon, John, & Kathryn, 2006; Hutchinson, Chery, & Sae-Sook, 2006)。但是參與傳統的活動同時意涵著某種社會控制，因此來自父母及師長的支持態度，則會扮演某種程度的重要性(Mahoney & Haekah, 2000)。易言之，如果父母、師長沒有給予足夠的支持性，將可能也會阻礙青少年參與傳統的休閒活動（趙善如，2008）。

Hirschi 在對參與要素進行測量方法上的探討時，即曾指出要將參與要素與其他社會連結之間的關係分離是非常困難的。其中，又以參與和抱負之間的關係最難釐清。因此，許多研究即對控制理論提出批判，如 Minor(1977)即認為「參與」是一種模糊不清的理論用語；Hindelang(1973)則認為參與傳統活動除非是與抱負有關，否則根本是不重要的；而 Krohn 與 Massey(1980)亦有類似的主張，認為參與因素在實證研究的測量上可納入抱負因素。Costello 和 Paul(1999)重新分析 Hirschi 當時所使用的資料發現，可將 Hirschi 原先提出的承諾及參與合併成一個新的要素「對學校的依附」。因此，儘管學者間對參與要素的看法不一，甚至主張參與要素在社會控制理論的重要性不如其他要素（侯崇文，2001；Agnew, 1991）。本研究認為針對參與要素給予一個精準的測量以釐清概念的內涵，應是有其必要性。綜上所述，可發現社會控制理論中的參與要素的要點如下：1. 由於時間與精力的限制，如果父母、師長沒有給予足夠的支持性，將可能也會阻礙青少年參與傳統的活動，進而影響偏差行為的發生；2. 適當的參與傳統活動能夠提供青少年體驗不同

生活角色，並有助於化解生活中壓力及情緒困擾；3. 不同活動之間可能具有關聯性且彼此互相影響。並根據研究目的將參與傳統活動歸納為參與學校及學習活動、參與休閒活動及家庭活動等三類。

三、一般化緊張理論(General Strain Theory)

Agnew 於 1985 及 1992 年提出「一般化緊張理論」觀點，由社會心理學角度將傳統緊張理論之缺失加以補強，不但保留了傳統緊張理論主張社會結構對偏差行為所造成的影響，還包括了個人特質、互動關係及週遭環境因素的影響效力（董旭英，2003）。Agnew(1992, 2006)指出個體偏差行為的形成，是因為處於一個緊張的情境中，當個人經歷緊張或壓力經驗時，更有可能從事偏差行為或犯罪。而個人緊張的來源可被區分為三方面：其一，未能達到期望中的目標(failure to achieve positively valued goals)。包含：抱負與期望成就的落差、預期的成就與真正達成的成就有所差距，以及認為公平的結果與實際的結果有落差。這些情形都會造成青少年的挫折與憤怒的情緒，若個人無法用合法的手段紓解差異造成的緊張與不安感時，則可能以偏差行為作為改善差距的手段。其二，生活中個人失去正向的刺激(removal of positive stimuli)。當個人生活中所喜歡之人、事、物消失，離去或破壞時，皆會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而導致緊張與負面的情緒發生。此時若未能找到正當途徑適時加以紓解，便容易產生衝動的攻擊行為或是消極的逃避行為。其三，生活中負面刺激的產生(confrontation with negative stimuli)。生活中負面刺激是指發生令人焦慮不安的事情。例如學校生活壓力、受虐、暴力受害者、親子關係不良、受同儕排斥等。當個人遇到上述情形時，若無法使用有效策略或方法來減輕此挫折感與不安，則極易採取直接或間接對負向刺激來源做反擊，或是使用逃避的手段加以逃離。

Agnew(1992)認為產生壓力的負面刺激(negative stimuli)可以是被虐待、疏忽、犯罪被

害、體罰、家庭生活、學校生活挫折，以及有壓力的生活事件等。很顯然地，緊張理論提供了一種從心理忍受度的角度來解釋青少年內向性及外向性偏差行為的一個有效的論點。Akers(1997)指出 Agnew 的理論兼顧到個人內因性與外因性對偏差行為形成的影響。例如，個人特質對緊張情緒的反應，發展機會，家庭關係、同儕關係、學校生活等。而本研究依據一般緊張理論的觀點，歸納出三項與高中生偏差行為相關之社會緊張因素。首先，是為在家庭環境中與家人的負面關係，例如父母親、手足及親戚間的關係。Agnew 認為當個人處於負面刺激愈多，刺激的強度愈大時，對於其產生偏差行為的影響愈大。因此，青少年若與家人的關係長期處於負向，此種緊張的關係會產生與家人的疏離感；其次為預期的教育目標，例如自己未來的生涯規劃（就業、升學、留學）等；第三為負面的生活事件，例如學校生活的不順遂、受到班上同學的嘲弄、欺負等等，當壓力紓解無效時，會造成青少年產生緊張、焦慮的情緒，進而產生挫折與壓力，則易產生偏差行為。

四、社會控制理論、一般緊張理論與青少年偏差行為之關係

Hirschi(1969)認為個人並非不想或不願從事某些活動，而是因為每個人無疑地都會受到時間與精力所限制，使得個人欠缺機會去進行那些原本可能會從事的活動。易言之，個人很可能因忙碌於某些傳統活動而間接降低了從事偏差行為的可能性，這些人可以說就是受惠於缺乏做壞事的時間與精力，才能免於掉入罪惡的陷阱中。因此，倘若青少年愈依附於父母、師長及同儕，自然也將愈在意父母、師長及同儕的期待及眼光，也就愈會參與教育或其他與學校有關的活動；反之，一旦青少年不在意父母、師長及同儕的期待及眼光，則願意將時間及精力投入教育或其他與學校有關活動的可能性自然也就大為降低。換言之，親子、師長、同儕之間的關係，若是長期處於依附關係不

佳、緊張的狀況下，青少年因為此種生活中負面刺激的產生，若無法使用有效策略或方法來減輕此挫折感與不安，則極易採取直接或間接對負向刺激來源做反擊，或是使用逃避的手段加以逃離。其逃離方式若是外顯於外，則形成外向性偏差行為，如抽煙、嚼檳榔、逃學、離家出走、打架、辱罵師長或同學等；若是內隱而內，則形聚成內向性偏差行為，如學習焦慮、情緒困擾、憂鬱、孤獨感等。

其次，就一般化緊張理論看來，青少年若因父母的教養方式不良、同儕間的排斥以及在學校學業成就的低落等，所造成的依附關係不佳亦會產生緊張關係(Agnew, 2001)，進而降低參與家庭活動的機會，而此負面情緒假使無法經由正常管道加以排除，個體可能會從事偏差行為以降低或消除此負面的不適感。研究指出，當個體感到不舒服時，對於情緒的關注且反覆思索會伴隨一連串不利的後果，例如思考偏差、問題解決能力受損、動機下降、功能性行為受到抑制、注意力與認知功能受損、增加額外壓力源與問題，以及產生負向情緒與憂鬱症狀等內向性行為問題(Butler & Nolen-Hoeksema, 1994; Lyubomirsky & Nolen-Hoeksema, 1995; Lyubomirsky, Tkach, & Robin-DiMatteo, 2006)。青少年面對愈多的負面生活事件或生活困擾經驗，愈容易發生偏差行為，當青少年與成人（如父母和老師）的關係緊張程度愈高，他們的偏差行為出現頻率愈高（董旭英，2003）。Wong(2005)以加拿大七到12年級的學生為樣本，重新驗證社會控制理論中的參與因素所進行之研究。結果發現學校及家庭相關活動都能降低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發生。然而，其他如花時間和朋友在一起相處及約會等傳統活動，則反而會增加偏差行為發生。此外，該研究亦發現各種不同活動的參與透過其他社會鍵對偏差行為所產生的間接效應反而較其直接效應強。由此，可知青少年在參與學校及家庭的活動時，因為時間的投入，若是能獲得課業、學業成就的滿足，或是在參與家庭活動中得到父母的關懷、讚賞與認可，皆

會降低負面的影響，而避免緊張與負面情緒的發生。若是未能找到正當途徑適時加以紓解因參與傳統活動所帶來的負面刺激，便容易產生衝動的攻擊行為或是消極的逃避行為。

研究指出在探討偏差行為形成時，應將可能發生影響之個人屬性變項予以控制，才不至造成結果之扭曲(許春金, 1986; 董旭英, 2003; Simons, Wu, Conger, & Lorenz, 1994)。故本研究擬納入年齡、性別、公私立學校、學程類別及城鄉分層等個人屬性變項作為控制變項。檢視當納入這些控制變項後，依附關係、參與傳統活動、緊張因素與依變項間之關係是否產生變化，藉以建立一個較為完整的分析例子，並檢驗自變項和依變項間是否存在假性相關。綜合上述對社會控制理論、一般緊張理論之測量方式及實徵研究發現，本研究的社會控制變項包括：依附父母、依附學校、依附同儕、參與學校及學習活動、參與休閒活動及參與家庭活動；社會緊張因素包括：與家人負面關係、預期的教育目標及負向生活事件。並探討這些因素對外向性及內向性偏差行為的影響，並納入性別、年齡、學程類別、公私立學校及城鄉地區分層別等控制變項用以檢視各變項之間的關係。具體而言，本研究希望回答下列問題：

- (一) 依據社會控制理論、一般緊張理論及相關實徵研究結果，所歸納出七個社會控制變項：依附父親、依附母親、依附學校、依附同儕、參與學校及學習活動、參與休閒活動及參與家庭活動，及三個主要社會緊張源：與家人負面關係、預期的教育目標及負向生活事件，是否會影響青少年之外向性及內向性偏差行為的發生？
- (二) 社會控制理論、一般緊張理論對於青少年外向性及內向性偏差行為的發生是否具有相同的影響效應？

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用「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簡稱 TEPS) 問卷資料，針對青少年的依附關係和參與各種活動與偏差行為發生的關聯性進行分析。此項資料是由中央研究院、教育部和國科會共同資助，並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和歐美研究所共同負責規劃與執行的一項全國性長期的資料庫計畫，計劃主持人為張苙雲教授。該項計劃預計從 2001 年迄 2007 年結束，調查範圍涵蓋臺灣地區的國中、高中、高職及五專的學生，為臺灣地區教育研究領域具代表性的長期資料庫。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以 TEPS 於 2005 年下半年第三波調查中之新生樣本內，高二及專二的學生為樣本(以下統稱為高中生)，共計有效樣本為 10,658 人，男生 5,362 人，女生 5,296 人。

二、研究工具及分析方法

(一) 依變項

本研究之依變項為高中生內向性及外向性偏差行為，其操作性定義採用 TEPS 調查問卷中的自陳式報告，受訪者就當學期內是否曾經發生或參與偏差行為，依行為頻率選擇適當答案，做為實際從事偏差行為的情形。計分方式依序為答「從來沒有」者給 1 分，「偶爾有」者給 2 分，「有時有」者給 3 分，「經常有」者給 4 分。

1. 內向性偏差行為：包含有不想和別人來往；鬱卒；想要大叫；摔東西、吵架或打人；不想活了；感到孤單；感到無助，沒有人可以依靠；睡不著、睡不好、很容易醒、做惡夢；頭部緊緊的、身體感到發麻、針刺、虛弱或手腳發抖；總是覺得睡不夠；覺得受到關心和愛護；覺得很倒楣；被激怒；覺得後悔、自責；緊張、焦慮或急躁；疲倦或精疲力竭；事情太多做不完；壓力很大等 12 題組成。建構青少年內向性偏差行為指標時，本研究以上述 12 個高中生內向性偏差行為項目所取的平均值表示，其最小值為

1，最大值為 4，即青少年內向性偏差行為變項所取的值愈高，其內向性偏差行為發生也愈高，此 12 個項目所建構之高中生內向性偏差行為指標測得的內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 為 .903。

2.外向性偏差行為：本研究之高中生外向性偏差行為包含有八個項目：考試作弊；逃學；蹺課；在學校打架，或和老師起衝突；看黃色書刊、光碟或上色情網站；抽煙、喝酒或吃檳榔；逃家；偷竊或破壞他人物品。建構青少年外向性偏差行為指標時，本研究以上述八個高中生偏差行為項目所取的平均值表示，其最小值為 1，最大值為 4，即青少年偏差行為變項所取的值愈高，其外向性偏差行為發生也愈高，此八個項目所建構之高中生外向性偏差行為指標測得的內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 為 .748。

(二) 自變項

本研究各自變項係依據社會控制理論及一般緊張理論延伸而來，發展與區分出「依附關係」、「參與傳統活動」、「緊張因素」等三種自變項。故其屬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代表所得資料與欲測量之目標相符。

1. 依附關係量表

依據 Hirschi 之相關理論及實證研究，本研究發展與區分出「依附父親」、「依附母親」、「依附學校」、「依附同儕」等四類依附關係。

(1)依附父親：由爸爸會不會和你談升學或就業的事情、爸爸會不會聽你講內心的話、爸爸會不會看你的作業，考卷或成績單瞭解你的學習情況、爸爸會不會參加學校的活動或擔任家長會委員或義工等四題組成，以四點量表測量，4 代表「經常會」，1 代表「從來不會」，得分愈高代表其依附父親情形愈高。

(2)依附母親：由媽媽會不會和你談升學或就業的事情、媽媽會不會聽你講內心的話、媽媽會不會看你的作業，考卷或成績單瞭解你的學習情況、媽媽會不會參加學校的活動或擔任家長會委員或義工等四題組成，以四點量表測量，4 代表「經常會」，1 代表「從來不會」，得分愈

高代表其依附母親情形愈高。

(3)依附同儕：由有幾個常常在一起的朋友、這些朋友中，有幾個成績很好或喜歡讀書的、有幾個多才多藝的、這些朋友中，有幾個是可以談想法或心事的等四題組成，以六點量表測量，6 代表「11 個(含)以上」，1 代表「沒有」，得分愈高代表其依附同儕情形愈高。

(4)依附學校：由覺得現在就讀的學校是可以交朋友的地方、有趣的地方、學到東西的地方、獎懲公平、成績評分公平、關心學生等六題組成，以四點量表測量，4 代表「非常同意」，1 代表「非常不同意」，得分愈高代表其依附學校情形愈高。

2. 參與傳統活動量表

(1)參與學校及學習活動：由每星期通常花多少時間參加校內的課後輔導(含第八節課)、每星期通常花多少時間參加校外補習或家教、每星期通常花多少時間上網查資料，以完成作業、現在每星期通常要花多少時間參加學校的社團活動，校隊或代表隊的培訓活動等四題組成，以六點量表測量，6 代表「16 小時(含)以上」，1 代表「沒有」，得分愈高代表其參與學校及學習活動情形愈高。

(2)參與休閒活動：由聽流行音樂或參加流行音樂會、聽古典音樂，觀賞舞蹈或戲曲表演等、參觀科技展，電腦展或科學博物館、參觀美術展，藝文展覽或博物館等四題組成，以四點量表測量，4 代表「經常」，1 代表「沒有」，得分愈高代表參與休閒活動情形愈高。

(3)參與家庭活動：由每天幫忙做家事或做生意、平常爸爸媽媽會不會帶著你拜訪親戚朋友等二題組成，以四點量表測量，4 代表「經常」，1 代表「沒有」，得分愈高代表參與家庭活動情形愈高。

3. 緊張因素量表

(1)與家人負面關係：由在家中你覺得自己是被出氣的對象、被忽略的人、被使喚的人等三題組成，以四點量表測量，4 代表「非常同意」，1 代表「非常不同意」，得分愈高代表其與家人負面關係愈高。

(2)預期教育目標：本部份係參酌 Short、Rivera 與 Tennyson(1965)測量「緊張」的方法，由期望自己唸到何種教育程度、以你的能力，你認為自己可唸到什麼程度、爸爸媽媽期望你唸到什麼程度等三題組成，以六點量表測量，6 代表「念到博士學位」，1 代表「沒想過或不知道」，得分愈高代表其覺得自己受教育機會未受到任何阻礙。

(3)負面生活事件：由上高中職／專科以來，下列事件曾否發生在你身上：在學校被偷、有人想賣非法藥品給我、有人恐嚇我、有人勒索我或搶奪我的東西、有人對我進行性騷擾或性侵害、因行為問題被叫到學務處、訓導處或教官室、因為課業問題被叫到老師辦公室、因為曠課，學校通知家人、因為其他行為問題，學校通知家人等九題組成，以四點量表測量，4 代表「五次以上」，1 代表「沒有」，得分愈高代表其與家人負面關係愈高。

(三) 控制變項

本研究納入年齡、性別、公私立學校、學程類別及城鄉分層等個人屬性變項作為控制變項。檢視當納入這些控制變項後，依附關係、參與因素、社會緊張因素與依變項間之關係是否產生變化，藉以建立一個較為完整的分析例子，並檢驗自變項和依變項間是否存在假性相關。

1.年齡：分別為 75 年出生取值為 1，74 年出生取值為 2，73 年出生取值為 3，72 年出生取值為 4，71 年出生取值為 5。

2.性別變項：分別為男性取值為 1，女性取值為 0。

3.學程類別：由一組虛擬變項所構成，包括綜

合學程、高職，以及五專作為參照變項。

4.公私立學校：分別為公立取值為 1，私立取值為 0。

5.城鄉地區分層別：由一組虛擬變項所構成，包括鄉村及城鎮作為參照變項。

三、資料分析與統計方法

本研究以平均數、標準差等描述性統計分析(Descriptive statistics)來檢視各變項之分佈情形；再由相關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統計方法分析各變項與內向性及外向性偏差行為間的關聯性；最後則以巢式迴歸模型(Nested regression model)分析技術建構社會控制、緊張因素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解釋模型，如表 1 所示，共包括八個模型組。

模型一先置社會控制的依附關係之四個次變項，模型二中，放進社會控制參與傳統活動的三個次變項。在模型三中，加入緊張因素的三個次變項，模型四則是同時納入社會控制的依附關係及參與傳統活動的七個變項，模型五置入社會控制的依附關係及緊張因素二個自變項，模型六則是納入社會控制的參與傳統活動與緊張因素二個自變項，模型七則是放入社會控制及緊張因素等計十個次變項，在模型八中，放入社會控制及緊張因素兩個自變項，並納入控制變項（年齡、性別、學程類別、公私立學校、城鄉地區分層別）檢視。

表 1 巢式迴歸各模型變項表

依變項	模型	變項
偏差行為	一	社會控制（依附關係）
	二	社會控制（參與傳統活動）
	三	緊張因素
	四	社會控制（依附關係、參與傳統活動）
	五	社會控制（依附關係）、緊張因素
	六	社會控制（參與傳統活動）、緊張因素
	七	社會控制、緊張因素
	八	社會控制、緊張因素、控制變項

表 2 高中生各變項描述性統計分析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偏態	峰度	樣本數
依變項							
內向性偏差行為	2.202	.535	1.00	4.00	.280	.230	10657
外向性偏差行為	1.225	.333	1.00	4.00	3.658	19.723	10657
常態化後之外向性偏差行為	.077	.091	.00	.60	2.027	5.887	10657
自變項							
依附關係							
依附父親	2.202	.685	1.00	4.00			10658
依附母親	2.613	.694	1.00	4.00			10658
依附同儕	3.157	.755	1.00	6.00			10658
依附學校	2.803	.332	1.00	4.00			10658
參與傳統活動							
參與學校及學習活動	2.398	.711	1.00	6.00			10658
參與家庭活動	2.258	.525	1.00	4.00			10658
參與休閒活動	2.177	.632	1.00	4.00			10658
緊張因素							
與家人負面關係	1.936	.708	1.00	4.00			10658
預期教育目標	3.480	1.313	1.00	6.00			10658
負面生活事件	1.200	.320	1.00	4.00			10658

結果與討論

一、各變項之描述性資料分析

此節依序說明高中生外向性、內向性偏差行為、社會控制、緊張因素及個人屬性等變項之數值分佈情形及平均值狀況，如表 2 所示。本研究之依變項為「內向性偏差行為」及「外向性偏差行為」，內向性偏差行為的平均數為 2.202，在外向性偏差行為部分，由表 2 可知，受試者從事外向性偏差行為次數不多。以其圖形分配狀況來看，呈現正偏態及高狹峰(leptokurtic)情形，也就是說，高中生外向性偏差行為之分布較為集中，在次數低的一方，亦即未從事外向性偏差行為之人數較多。因此，為考慮迴歸模式中，依變項應符合常態分配性原則，故本研究將此依變項取對數處理，對數

值(log)為 10，將高中生外向性偏差行為常態化(normalization)。經對數程序處理過後，可由表 1 得知，青少年偏差行為之平均數為 .077，標準差為 .091。

整體而言，本研究之受訪高中生報告曾參與偏差行為者較少。在自變項方面，依附關係之依附同儕平均數為 3.157，依附學校平均數為 2.803，依附母親平均數為 2.613，依附父親平均數為 2.202。參與傳統活動方面，參與學校及學習活動平均數為 2.398，參與家庭活動平均數為 2.258，參與休閒活動平均數為 2.177。緊張因素變項之預期教育目標平均數為 3.480，與家人負面關係平均數為 1.936，負面生活事件平均數為 1.200。從發展的過程來看，青少年是介於兒童期與成人期之間的一個人生階段，青少年逐漸脫離他人而形成獨特自我的階段(Erickson, 1968)。因此，對父母師長的依附程度降低是自然現象。Gottfredson 和

Hirschi(1990)指出，學校可能比家庭更具有優勢，所以當青少年與老師之間相處欠佳、師生關係疏遠，且較不喜歡上學，甚至覺得學校生活乏味，就可能會向外尋求發展，此時學校的控制力量將會減弱。簡言之，在探討父母、同儕及學校的依附關係時，應該把焦點放在決定父母、同儕及學校各自影響的領域(domain)，而非影響的大小程度。

二、自變項與依變項之相關情形

本研究採用皮爾森(Pearson)積差相關係數，以雙尾檢定方法檢測各自變項與內向性及外向性偏差行為間的相關情形。

(一) 外向性偏差行為

由表 3 顯示，「依附母親」、「依附學校」、「參與學校及學習活動」、「參與家庭活動」、「參與休閒活動」及「預期教育目標」等變項與外向性偏差行為皆呈現顯著的負相關($r = -.079$ 、 $-.193$ 、 $-.029$ 、 $-.023$ 、 $-.027$ 、 $-.031$)；而「與家人負面關係」及「負面生活事件」與外向性偏差行為則呈現顯著正相關($r = .116$ 、 $.420$)。

。意即，當青少年愈依附母親及學校，積極參與學校及學習、家庭、休閒活動，期許自己未來可修讀教育程度愈高，其發生外向性偏差行為的次數愈少；而青少年與家人負面關係及負面生活事件愈高，則其發生外向性偏差行為的機會愈大。

(二) 內向性偏差行為

根據表 4 可知，「依附父親」、「依附同儕」、「依附學校」、「參與家庭活動」等變項與內向性偏差行為皆呈現顯著的負相關($r = -.039$ 、 $-.076$ 、 $-.112$ 、 $-.059$)；而「參與學校及學習活動」、「參與休閒活動」、「與家人負面關係」、「預期教育目標」及「負面生活事件」與內向性偏差行為則呈現顯著正相關($r = .103$ 、 $.064$ 、 $.220$ 、 $.056$ 、 $.105$)。換言之，當青少年愈依附父親、同儕及學校，積極參與家庭活動，其發生內向性偏差行為的次數愈少；而青少年參與學校及學習活動、休閒活動愈多，以及與家人負面關係、預期教育目標及負面生活事件愈高，則其發生內向性偏差行為的機會愈大。

表 3 高中生外向性偏差行為各變項相關分析摘要表

變項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1										
2	-.002	1									
3	-.079***	.341***	1								
4	.018***	.121***	.118***	1							
5	-.193***	.033**	.081***	.044***	1						
6	-.029**	.131***	.160***	.137***	.014***	1					
7	-.023*	.188***	.211***	.111***	.053***	.094***	1				
8	-.027**	.146***	.192***	.177***	.018***	.229***	.163***	1			
9	.116***	-.108***	-.165***	-.061***	-.168***	-.010	-.011	.005	1		
10	-.031**	.172***	.175***	.093***	.017	.202***	.046***	.158***	-.073***	1	
11	.420***	.035***	-.039***	.030**	-.236***	.078***	.022*	.042***	.158***	-.022*	1

註：變項代碼依序為 1.外向性偏差行為、2.依附父親、3.依附母親、4.依附同儕、5.依附學校、6.參與學校及學習活動、7.參與家庭活動、8.參與休閒活動、9.與家人負面關係、10.預期教育目標，及 11.負面生活事件

* $p < .05$ ** $p < .01$ ；*** $p < .001$

表4 高中生內向性偏差行為各變項相關分析摘要表

變項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1										
2	-.039***	1									
3	-.003	.341***	1								
4	-.076***	.121***	.118***	1							
5	-.112***	.033**	.081***	.044***	1						
6	.103***	.131***	.160***	.137***	.014	1					
7	-.059***	.188***	.211***	.111***	.053***	.094***	1				
8	.064***	.146***	.192***	.177***	.018	.229***	.163***	1			
9	.220***	-.108***	-.165***	-.061***	-.168***	-.010	-.011	.005	1		
10	.056***	.172***	.175***	.093***	.017	.202***	.046***	.158***	-.073***	1	
11	.105***	.035***	-.039***	.030**	-.236***	.078***	.022*	.042***	.158***	-.022*	1

註：變項代碼依序為 1.內向性偏差行為、2.依附父親、3.依附母親、4.依附同儕、5.依附學校、6.參與學校及學習活動、7.參與家庭活動、8.參與休閒活動、9.與家人負面關係、10.預期教育目標，及 11.負面生活事件
* $p < .05$ ** $p < .01$ *** $p < .001$

從以上分析觀察發現，「依附學校」及「參與家庭活動」與青少年的內向性及外向性偏差行為都有著顯著的負相關，且均達統計上顯著水準($p < .001$)；「與家人負面關係」及「負面生活事件」與青少年的內向性及外向性偏差行為，則都有著顯著的正相關，亦達統計上顯著水準($p < .001$)。可見青少年與學校的依附關係、家庭活動的參與程度、與家人關係的發展，以及日常負面的生活事件發生，在在都影響著青少年的外向性及內向性偏差行為的發生。但是「預期教育目標」與青少年內向性及外向性偏差行為的關係，則分別呈現著正負關係，且均達統計上顯著水準($p < .001$)。顯示當青少年對自己未來教育目標的期許愈高時，其發生內向性偏差行為的頻率愈大，但發生外向性偏差行為的可能性則愈小。這可能是青少年為修讀更高的教育目標，謀取較佳的教育成就時，促使青少年在課業、成績及升學上力求表現，另一方面卻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產生影響(West & Sweeting, 2003)，使得預期教育目標與青少年的內向性偏差行為的關係趨向正面；但是當青少年期望自己能獲得更好的教育目標及成就時，就會積極於課業、成績的努力，更注意自己行為的表現，及在意他人對自己的觀感，也

就無暇從事外向性偏差行為，因此預期教育目標與青少年的外向性偏差行為的關係趨於負向。

就相關分析的結果來看，青少年內向性偏差行為與「依附父親」、「依附同儕」、「依附學校」、「參與家庭活動」、「參與學校及學習活動」、「參與休閒活動」、「與家人負面關係」、「預期教育目標」及「負面生活事件」之相關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外向性偏差行為與「依附母親」、「依附學校」、「參與學校及學習活動」、「參與家庭活動」、「參與休閒活動」、「預期教育目標」、「與家人負面關係」及「負面生活事件」之相關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顯示兩兩變項之間有相關性存在，此與前述之文獻觀點一致。然而，由於相關係數是在假設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顯示各變項之間的相關程度，其佐證力稍嫌薄弱，故本研究將以巢式迴歸分析方法，做進一步的驗證，並檢驗變項間是否存在假性相關之現象，以釐清各項因素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影響，俾使所得結果更為詳實。

三、依附關係、參與傳統活動、緊張因素與青少年偏差行為之關聯性

以下依本研究在自變項、控制變項與偏差行為方面所建構之八個模型，分別就內向性及外向性偏差行為加以分析如表 5、表 6，並分述如下：

(一) 外向性偏差行為

1. 模型一至三：檢視依附關係、參與傳統活動、緊張因素的個別影響

由表 5 可知，在模型一檢視附關係與外向性偏差行為之關聯性，依附父親、依附同儕與外向性偏差行為呈現顯著正向關係($B = .003$ 、 $p < .05$ ； $.004$ 、 $p < .01$)，依附母親、依附學校與外向性偏差行為則呈現顯著負向關係($B = -.010$ 、 $p < .001$ ； $.052$ 、 $p < .001$)，模型一的決定係數(R^2)為 $.043$ ，表示其對外向性偏差行為的解釋力約為 4.3% 。在回顧表 4 相關矩陣分析可知，在假設其他條件相同時，依附父親和同儕與青少年的外向性偏差行為，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效應，但當在表 5 模型一中同時納入依附母親及學校效應後，依附父親、同儕對於外向性偏差行為的影響則呈現正相關，意即在加入依附母親及依附學校變項後，依附父親、同儕對外向性偏差行為之影響「方向」由無轉為正，其原因可能是交互作用之效應存在，有待更進一步的檢視。在華人社會家庭關係中，父親權威、勇者、不可挑戰的形象深深烙印在子女心中。因此，父親對子女的期望一方面代表重視與關懷，另一方面也可能成為負面親子關係的重要來源。以致於青少年愈依附於父親，愈容易威攝於父親的權威，進而產生外向性偏差行為，藉以抵抗父親或消弭心中的不滿。在依附同儕方面，這可能是接觸到偏差同儕，導致青少年外向性偏差行為發生之故。Akers(1997)歸納國外研究結果指出，只有在依附正當的朋友時，朋友依附才會產生控制犯罪的正面作用，與偏差朋友的依附會帶來青少年更多的犯罪行為。因為同儕是仿效對象與獲得認同的來源(Erikson, 1968)，它提供成員歸屬感、情緒上的支持與行為模式，或一套不同於家庭生活的規範和價值，同儕彼此之間會透過

活動參與發生相互影響，而學習到反社會行為。

模型二檢視參與傳統活動變項與外向性偏差行為的關係，參與學校及學習活動與外向性偏差行為呈顯著負向關係($B = -.003$ 、 $p < .05$)，參與家庭活動、參與休閒活動與外向性偏差行為未達統計上顯著效應($p > .05$)，模型二的決定係數(R^2)為 $.002$ ，表示其對外向性偏差行為的解釋力約為 0.2% 。青少年要是專注於本身的學業，便會全心全力的奉獻自己的時間和精力去參與，自然沒有時間感到無聊，也就沒有多餘的時間去和他人閒聊或遊玩(董旭英、張楓明、李威辰，2003)。而 Cernkovich 和 Giordano(1992)更進一步指出，當青少年參與學校活動頻率愈高、愈依附於學校時，其偏差行為的發生率便下降。

模型三顯示，與家人負面關係及負面生活事件與外向性偏差行為呈現顯著正向關係($B = .006$ 、 $p < .001$ ； $.117$ 、 $p < .001$)，預期教育目標則呈現顯著的負向關係($B = -.001$ 、 $p < .05$)，模型三的決定係數(R^2)為 $.179$ ，表示其對外向性偏差行為的解釋力約為 17.9% 。Agnew(1992)指出，當個體面對生活挫折與負面事件時，以及預期的結果與實際出現的結果有所落差時，會造成不安感與憤怒的情緒，並導致以偏差行為作為防衛策略。例如當覺得自己應該與其他青少年一樣，擁有豐富的物質享受，但在實際感受上並不如此；又或者是在生活上常常碰到挫折或不愉快的事情，都會容易造成偏差行為的變化。Agnew 認為當個人無法使用合法的手段消除未能達到期望中的目標差異，以減低挫折及憤怒的情緒時，偏差及犯罪行為常會被作為達成期望中目標的手段。換言之，青少年若有較高的預期成就，為了達到此預期的成就，就會積極於目標的努力。這是因為，青少年的期望常為一些立即性的目標，如考試得到好成績、穿著有品味、獲得異性青睞或在比賽中優勝等，而這些立即性的目標對青少年而言較為容易達成。

表 5 高中生外向性偏差行為巢式迴歸模型摘要表 (N=10,658)

變項／未標準化迴歸係數	模型一 (B)	模型二 (B)	模型三 (B)	模型四 (B)	模型五 (B)	模型六 (B)	模型七 (B)	模型八 (B)
自變項								
依附關係								
依附父親	.003*			.004**	.001		.002	-.001
依附母親	-.010***			-.009***	-.007***		-.006***	-.003*
依附同儕	.004**			.004***	.002*		.003**	.003**
依附學校	-.052***			-.052***	-.025***		-.025***	-.019***
參與傳統活動								
參與學校及學習活動		-.003*		-.003*		-.007***	-.006***	-.003*
參與家庭活動		-.003		-.001		-.004*	-.002	-.004*
參與休閒活動		-.003		-.002		-.004**	-.004**	-.002
緊張因素								
與家人負面關係			.006***		.004**	.006***	.004***	.005***
預期教育目標			-.001*		-.001	.001	.001	.001
負面生活事件			.117***		.111***	.119***	.113***	.094***
控制變項								
年齡								.013***
性別								.038***
學程類別 (普通學程=對照組)								
綜合學程								.009***
高職								.008***
五專								.023***
公私立學校								.004
城鄉地區分層別 (都市=對照組)								
鄉村								-.005***
城鎮								-.010***
常數	.229***	.097***	-.071***	.237***	.019*	-.044***	.032**	-.169***
決定係數(R ²)	.043	.002	.179	.044	.190	.184	.194	.251
調整後(adj R ²)	.043	.001	.179	.043	.190	.184	.193	.250
F 檢定	120.229***	5.650**	776.412***	69.934***	357.862***	400.870***	256.423***	197.853***

註：* $p < .05$ ** $p < .01$ *** $p < .001$ VIF < 2.0

2. 模型四：檢視依附關係與參與傳統活動與外向性偏差行為之關聯性

從表 5 的模型四可知，檢視附關係、參與傳統活動與外向性偏差行為之關聯性，依附父親、同儕與外向性偏差行為仍具有著顯著的正向關係($B = .004$ 、 $p < .01$ ； $.004$ 、 $p < .001$)，依附母親、依附學校、參與學校及學習活動與外向性偏差行為則是呈現顯著的負向關係($B = -.009$ 、 $p < .001$ ； $-.052$ 、 $p < .001$ ； $-.003$ 、 $p < .05$)，但是參與家庭活動、參與休閒活動與外向性偏差行為則未達統計上顯著效應($p > .05$)。意即青少年愈依附於父親及同儕，其發生外向性偏

差行為的次數愈多，愈依附於母親、學校，積極參與學校及學習活動，愈能減少其外向性偏差行為發生的次數。模型四的決定係數(R²)為 .044，表示模型四對外向性偏差行為的解釋力約為 4.4%。

3. 模型五：檢視依附關係、緊張因素與外向性偏差行為的關係

由表 5 所示，依附母親、依附學校與外向性偏差行為呈現顯著的負向關係($B = -.007$ 、 $p < .001$ ； $-.025$ 、 $p < .001$)，依附同儕、與家人負面關係、負面生活事件與外向性偏差行為呈現顯著正向關係($B = .002$ 、 $p < .05$ ； $.004$ 、 p

$< .01$; $.111$ 、 $p < .001$)，依附父親及預期教育目標則未達統計上顯著效果($p > .05$)。也就是說，與母親及學校的依附關係愈佳，外向性偏差行為發生的次數愈少；依附同儕、與家人負面關係、負面生活事件愈高，發生外向性偏差行為的機會愈大。模型五的決定係數(R^2)為 $.190$ ，表示其對外向性偏差行為的解釋力約為 19.0% 。

4.模型六：檢視參與傳統活動、緊張因素與外向性偏差行為的關係

由表 5 所示，參與傳統活動的各個變項因為緊張因素的加入，除參與學校及學習活動對外向性偏差行為仍具有負向的影響力外($B = -.007$ 、 $p < .001$)，新增加了參與家庭活動及參與休閒活動對外向性偏差行為的負向影響力($B = -.004$ 、 $p < .01$ ； $-.004$ 、 $p < .01$)，與家人負面關係及負面生活事件與外向性偏差行為則呈現顯著正向關係($B = .006$ 、 $p < .001$ ； $.119$ 、 $p < .001$)；但是緊張因素的預期教育目標則變的不具影響力。換言之，參與學校及學習活動、參與家庭活動及參與休閒活動愈多，外向性偏差行為發生的次數愈少；與家人負面關係及負面生活事件愈高，發生外向性偏差行為的機會愈大。這可能是受到與家人負面關係及負面生活事件的影響，青少年將其有限的時間與精力投入傳統活動，藉著時間的消耗、工作、運動、娛樂、嗜好及參與各種活動的推展，將能有效的阻絕青少年產生偏差行為之機會。模型六的決定係數(R^2)為 $.184$ ，表示其對外向性偏差行為的解釋力約為 18.4% 。

5.模型七至八：納入社會控制、緊張因素及控制變項，探討其對外向性偏差行為的影響

從表 5 可知，依附母親及學校仍具有顯著的負向關係($B = -.006$ 、 $p < .001$ ； $-.025$ 、 $p < .001$)，依附同儕仍具有顯著正向關係($B = .003$ 、 $p < .01$)；參與學校及學習活動、參與休閒活動與外向性偏差行為仍具有顯著負向關係($B = -.006$ 、 $p < .001$ ； $-.004$ 、 $p < .01$)；與家人負面關係及負面生活事件與外向性偏差行為仍然呈現顯著正向關係($B = .004$ 、 p

$< .001$ ； $.113$ 、 $p < .001$)，依附父親、參與家庭活動、預期教育目標則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效果($p > .05$)，模型七的決定係數(R^2)為 $.194$ ，表示其對外向性偏差行為的解釋力約為 19.4% 。模型八則是共同納入社會控制、緊張因素及控制變項，各個控制變項與外向性偏差行為，除公私立學校未達統計上顯著效果($p > .05$)，其餘之年齡、性別、綜合學程、高職、五專、鄉村及城鎮則達統計上顯著效果($B = .013$ 、 $p < .001$ ； $.038$ 、 $p < .001$ ； $.009$ 、 $p < .001$ ； $.008$ 、 $p < .001$ ； $.023$ 、 $p < .001$ ； $-.005$ 、 $p < .001$ ； $-.010$ 、 $p < .001$)。換言之，年齡較大、男生比女生更容易發生外向性偏差行為；綜合學程、高職及五專青少年比普通學程、都市比城鎮及鄉村的青少年愈容易發生外向性偏差行為。進一步檢視納入年齡、性別、學程類別、公私立學校、城鄉地區分層別等控制變項後，依附父親、參與休閒活動及預期教育目標對外向性偏差行為則不具有影響力($p > .05$)，模型八的決定係數(R^2)為 $.251$ ，表示其解釋力約為 25.1% 。

(二) 內向性偏差行為

1.模型一至三：檢視依附關係、參與傳統活動、緊張因素的個別影響

由表 6 可知，在模型一檢視依附關係與內向性偏差行為之關聯性，依附父親、依附同儕及依附學校與內向性偏差行為呈顯著負向關係($B = -.028$ 、 $p < .001$ ； $-.049$ 、 $p < .001$ ； $-.177$ 、 $p < .001$)，依附母親與內向性偏差行為則呈現顯著正向關係($B = .021$ 、 $p < .001$)。換言之，青少年與父親、同儕及學校的依附關係愈佳者，其內向性偏差行為就愈少；但本研究亦顯示青少年愈依附母親，則其內向性偏差行為就愈多。一般而言，女性會以較內化的情緒，如哭、憂鬱、沮喪等方式來面對問題(陳毓文，2002)。因此當青少年過度依附母親時，極易感染女性陰柔的一面，經由此種情感的傳遞，使得青少年較容易出現內向性偏差行為。模型一的決定係數(R^2)為 $.019$ ，表示其對內向性偏差行為的解釋力約為 1.9% 。

表 6 高中生內向性偏差行為巢式迴歸模型摘要表 (N=10,658)

變項／未標準化迴歸係數	模型一 (B)	模型二 (B)	模型三 (B)	模型四 (B)	模型五 (B)	模型六 (B)	模型七 (B)	模型八 (B)
自變項								
依附關係								
依附父親	-.028***			-.033***	-.030***		-.030***	-.014
依附母親	.021**			.010	.036***		.031***	.012
依附同儕	-.049***			-.062***	-.050***		-.059***	-.056***
依附學校	-.177***			-.173***	-.102***		-.101***	-.129***
參與傳統活動								
參與學校及學習活動		.074***		.082***		.065***	.071***	.047***
參與家庭活動		-.078***		-.061***		-.077***	-.068***	-.053***
參與休閒活動		.045***		.059***		.037***	.046***	.028**
緊張因素								
與家人負面關係			.161***		.154***	.161***	.152***	.151***
預期教育目標			.030***		.032***	.021***	.023***	.018***
負面生活事件			.122***		.109***	.110***	.095***	.188***
控制變項								
年齡								-.001
性別								-.226***
學程類別 (普通學程=對照組)								
綜合學程								-.077***
高職								-.102***
五專								-.119***
公私立學校								-.016
城鄉地區分層別 (都市=對照組)								
鄉村								-.045*
城鎮								-.023*
常數	2.863***	2.103***	1.639***	2.743***	2.078***	1.621***	2.052***	2.076***
決定係數(R ²)	.019	.018	.059	.040	.070	.073	.085	.134
調整後 (adj R ²)	.019	.018	.058	.039	.069	.072	.084	.133
F 檢定	51.561***	64.915***	221.023***	62.670***	114.070***	138.994***	98.980***	91.701***

註：* $p < .05$ ** $p < .01$ *** $p < .001$ VIF < 2.0

模型二檢視參與傳統活動變項與內向性偏差行為的關係，參與學校及學習活動及參與休閒活動與內向性偏差行為呈現顯著正向關係(B

= .074、 $p < .001$ ；B = .045、 $p < .001$)，參與家庭活動與內向性偏差行為則是呈現顯著負向關係(B = -.078、 $p < .001$)，模型二的決定係數(R²)

為 .018，表示其對內向性偏差行為的解釋力約為 1.8%。意即青少年若積極參與家庭活動，代表其與家人的互動關係較佳，能在活動的過程中舒緩心中的負面情緒，則其內向性偏差行為發生的可能性較低；但是參與學校及學習活動、休閒活動次數越多，由於課業、成績或升學的壓力，以致於青少年常需花時間參加校內的課後輔導、校外補習或家教，青少年可能會為自己的學業成績感到高興或自卑沮喪，但也可能在過程中必須忍受失敗、挫折、孤寂，而有內向性偏差行為的問題。雖然適當的休閒參與能夠提供青少年體驗不同生活角色，並有助於化解生活中壓力(Hutchinson, Chery, & Sae-Sook, 2006)，但是休閒活動過程中的競技亦讓青少年在活動中受到挫敗、患得患失，因而阻礙了青少年的身心發展。

模型三顯示，與家人負面關係、預期教育目標及負面生活事件與內向性偏差行為呈現顯著正向關係($B = .161, p < .001$; $.030, p < .001$; $.122, p < .001$)。研究顯示，青少年與家人負面關係、預期教育目標及負面生活事件愈高，則其發生內向性偏差行為的可能性愈大。模型三的決定係數(R^2)為 .059，表示其對內向性偏差行為的解釋力約為 5.9%。台灣近期的許多研究亦指出，與父母的負面關係是台灣青少年生活壓力的主要來源(王淑女, 1994; 葉在庭, 2001; 廖經台, 2002)，也會導致偏差行為的發生(Tung, 2001)。當個體面臨到令其感到憤怒、沮喪、憂鬱、敵意或焦慮的事件時，通常會先試圖逃避，以減輕這些情緒所引發的不愉快經驗及感受，但往往就會因此產生各種內向性(如憂鬱症狀、自傷或自殺意念等)的偏差行為，或出現攻擊或消極逃避的外向性偏差行為(Hoffmann & Miller, 1998)。此外，教育目標自我期許高者為求更好的成就或害怕失敗，其心理、情緒上的壓力可能特別大；其他程度者或教育目標要求較小者，比較不會因目標成就的壓力而患得患失，有較健康的心理。教育目標的期許壓力很可能一方面促使青少年努力爭取成績力圖表現，但另一方面卻對青少

年的心理健康造成影響，使得教育目標與內向性偏差行為的關係趨向正面。

2.模型四：檢視依附關係及參與傳統活動與內向性偏差行為之關聯性

由表 6 顯示，依附父親、同儕、學校及參與家庭活動仍舊與內向性偏差行為維持著顯著的負向關係($B = -.033, p < .001$; $-.062, p < .001$; $-.173, p < .001$; $-.061, p < .001$)，參與學校及學習和休閒活動則是顯著的正向關係($B = .082, p < .001$; $.059, p < .001$)，依附母親在此模型中對內向性偏差行為的影響力降低了，變得不具顯著性($p > .05$)，此為參與傳統活動的各個變項對依附母親有壓抑效應。其因素可能是青少年花費很多時間於學校及學習活動和休閒活動，由於時間的投入，專注於學術活動、知識及學業的學習活動、康樂活動、運動及休閒活動等，但是繁忙的課業與成績要求產生一些心理壓力；以及參與家庭活動，如家族的聚會、幫忙協助家事等，導致與母親依附關係的改變。模型四的決定係數(R^2)為 .040，表示模型四對內向性偏差行為的解釋力約為 4.0%。

3.模型五：檢視依附關係及緊張因素與內向性偏差行為的關係

從表 6 可知，依附父親、同儕、學校與內向性偏差行為呈現顯著的負向關係($B = -.030, p < .001$; $-.050, p < .001$; $-.102, p < .001$)，依附母親、與家人負面關係、預期教育目標及負面生活事件與內向性偏差行為呈現顯著正向關係($B = .036, p < .001$; $.154, p < .001$; $.032, p < .001$; $.109, p < .001$)，意即與父親、同儕、學校有較佳的依附關係，其內向性偏差行為發生的次數愈低；但是愈依附於母親，與家人負面關係、預期教育目標、負面生活事件愈高，其內向性偏差行為發生的次數愈多。觀察發現，依附關係並未因緊張因素的加入而有所改變。模型五的決定係數(R^2)為 .070，表示其對內向性偏差行為的解釋力約為 7.0%。

4.模型六：檢視參與傳統活及緊張因素與內向

性偏差行為的關係

參與家庭活動仍舊維繫著顯著的負向關係($B = -.077$ 、 $p < .001$)，其餘的參與學校及學習活動、參與休閒活動、與家人負面關係、預期教育目標及負面生活事件與內向性偏差行為呈現顯著正向關係($B = .065$ 、 $p < .001$ ； $.037$ 、 $p < .001$ ； $.161$ 、 $p < .001$ ； $.021$ 、 $p < .001$ ； $.110$ 、 $p < .001$)，如表 6 所示。換言之，參與家庭活動愈多，內向性偏差行為發生次數愈少；參與學校及學習活動、參與休閒活動、與家人負面關係、預期教育目標及負面生活事件愈高，內向性偏差行為發生次數愈少。參與傳統活動並未因緊張因素的加入而有所改變。模型六的決定係數(R^2)為 $.073$ ，表示其對內向性偏差行為的解釋力約為 7.3% 。

5.模型七至八：納入社會控制、緊張因素及控制變項，探討其對內向性偏差行為的影響

由表 6 顯示，於模型七同時置入社會控制及緊張因素各變項後，在依附關係方面，依附父親、同儕及學校仍具有顯著的負向關係($B = -.030$ 、 $p < .001$ ； $-.059$ 、 $p < .001$ ； $-.101$ 、 $p < .001$)，依附母親仍亦具有顯著正向關係($B = .031$ 、 $p < .001$)；參與傳統活動部分，參與學校及學習活動、參與休閒活動與內向性偏差行為仍具有顯著正向關係($B = .071$ 、 $p < .001$ ； $.046$ 、 $p < .001$)，參與家庭活動仍舊呈顯著的負向關係($B = -.068$ 、 $p < .001$)；至於緊張因素，與家人負面關係、預期教育目標及負面生活事件與內向性偏差行為仍然呈現顯著正向關係($B = .152$ 、 $p < .001$ ； $.023$ 、 $p < .001$ ； $.095$ 、 $p < .001$)，顯見依附關係未因參與傳統活動及緊張因素的加入而改變，模型七的決定係數(R^2)為 $.085$ ，表示其對內向性偏差行為的解釋力約為 8.5% 。

最後，於模型八則是共同納入社會控制、緊張因素及控制變項，各個控制變項與內向性偏差行為，除年齡與公私立學校未達統計上顯著效果($p > .05$)，其餘之性別、綜合學程、高職、五專、鄉村及城鎮則達統計上顯著效果($B = -.226$ 、 $p < .001$ ； $-.077$ 、 $p < .001$ ； $-.102$ 、 $p < .001$ ；

$-.119$ 、 $p < .001$ ； $-.045$ 、 $p < .05$ ； $-.023$ 、 $p < .05$)。意即，女性高中生比男性高中生更容易出現內向性偏差行為。在學程類別上，普通學程的青少年相較於綜合學程、高職及五專的青少年較容易發生內向偏差行為，可能是普通學程的學生有著升學的壓力，造成其發生內向性偏差行為機會較大，此種情形又以都市裡的高中生更為明顯。進一步檢視納入年齡、性別、學程類別、公私立學校、城鄉地區分層別等控制變項後，依附父親及母親對內向性偏差行為不具有影響力($p > .05$)，這可能是性別、學程類別及城鄉地區分層別的差異會影響青少年依附父母的關係，而上述的推論，都須做進一步的研究與考驗來加以檢證。模型八的決定係數(R^2)為 $.134$ ，表示其解釋力約為 13.4% 。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結構性、系統性地檢驗社會控制理論中之依附、參與因素及一般緊張理論的社會緊張因素對青少年外向性及內向性偏差行為的影響，以期能瞭解依附父母、依附學校、依附同儕、參與學校及學習活動、參與休閒活動、參與家庭活動、與家人負面關係、預期教育目標及負面生活事件等是否皆與青少年外向性及內向性偏差行為發生具有關聯性，並探討不同影響因子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發生是否存在著相互影響等情形。以下依據分析結果提出結論及建議：

一、結論

(一) 根據 Hirshi 的理論，子女對父母的依附鍵如果微弱不緊密，便會增加偏差行為發生的可能性；如果對父母的依附強而有力，則會減少偏差行為發生的可能性。本研究發現青少年依附父母及同儕對於內向性及外向性偏差行為的影響，同時存在著增強及抑制的作用。愈依附於父親、同儕越不容易有內向性偏差行為，但是外向性偏差行為發生的次數會增加；

相反地，青少年與母親的依附關係愈佳，則其內向性偏差行為發生的次數愈多，外向性偏差行為則相對降低。此外，與學校的依附關係對於內向性或外向性偏差行為，均具有抑制的效應，且在高中階段的青少年與學校的依附關係是影響其偏差行為發生的主要因素。因此由研究結果顯示，相同的影響因子對於外向性及內向性偏差行為影響具有差異性，所以將偏差行為再具體分為內向性及外向性，將更能具體瞭解依附關係的變化。

（二）本研究發現，參與學校及學習活動對於青少年的外向性偏差行為，具有減緩的效應，卻會增加內向性偏差行為的發生；參與家庭及休閒活動對外向性偏差行為則不具影響力，但是參與家庭活動是可以減少內向性偏差行為發生的機會，參與休閒活動則是會增加內向性偏差行為發生的次數。由此可知，同樣是參與傳統活動，但在考量不同的偏差行為時，其所顯示的意涵是有差異的。

（三）研究結果顯示，與家人負面關係、預期教育目標較高、負面生活事件愈高，則其內向性偏差行為愈可能發生；與家人負面關係及負面生活事件愈高，其外向性偏差行為亦愈可能發生，但是預期教育目標愈高則其外向性偏差行為發生的次數則會減少，本研究結果符合一般化緊張理論的觀點。

（四）根據高中生外向性及內向性偏差行為各模型的解釋力可知，一般緊張理論較社會控制理論更能夠解釋台灣青少年偏差行為問題，且更適宜解釋外向性偏差行為。但是若結合社會控制理論及一般緊張理論，其整體解釋力優於各自的解釋能力。再就各變項解釋力情形，依附關係較不適宜用以解釋台灣青少年的內向性偏差行為，參與傳統活動則是不適用於解釋台灣青少年的外向性及內向性偏差行為。

（五）本研究結果呈現男性青少年比女性青少年較容易發生外向性偏差行為，但是女性青少年則較男性青少年容易發生內向性偏差行為。普通學程的青少年內向性偏差行為比率顯著高於綜合學程、高職及五專的青少年，但是

外向性偏差行為卻比較低。居住於都市裡的青少年相較於居住在城鎮、鄉村的青少年有較高的外向性及內向性偏差行為。

二、建議

家庭及學校是個體在社會化過程中主要接觸的兩大機構，尤其對青少年行為及觀念的養成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作用。因此，以下根據研究結果所得之結論，提出相關之應用性建議及對未來研究策略上的建言：

（一）本研究由測量分析結果發現，與父母或同儕依附關係的不足與過多，都會促進青少年從事偏差行為的傾向與動機之程度，只有在控制達到平衡時，青少年才會發展出合法守本分的行為。因此，父母與子女間的依附關係應維持在一個平衡點，避免溺愛或嚴格的管教方式，適時與子女對談瞭解其心中最深層的話語；與同儕之間的交往，父母應以參與的態度面對孩子的同儕，而非介入干涉孩子的交往情形，幫助子女解決問題，而不是打罵排斥子女。

（二）學校對於台灣青少年的偏差行為具有重要的影響能力，在此建議教師應多使用綜合溝通管道與學生溝通，加強師生間的情感依附關係，使青少年願意參與學校的學習活動，並視學生能力加以調整課業，以能力分組方式進行授課，讓青少年知道自己學業能力程度，而擬訂適當及合宜的教育成就目標，以免青少年因課業問題或預期教育目標落差而產生內向性偏差行為。

（三）本研究分析結果發現，與家人負面關係、預期教育目標、負面生活事件等變項，對台灣青少年的外向性及內向性偏差行為有顯著影響效用。顯示當青少年在面對人際關係、課業學業考試不佳、與異性交往、自己身材外貌、家中經濟狀況及未來的生涯規劃等問題時，若是無法有效調適處理，尋找適當輔導人員予以協助，容易因與家人負面關係、預期教育目標、負面生活事件所帶來的不舒服感及壓迫感，產生外向性或內向性偏差行為來宣洩或減輕。因此，學校教育應輔導青少年如何面對

生活中的挫折，以適當的方式抒解、宣洩生活負面刺激所造成的不良影響。

(四) 以往關於偏差行為的研究，多側重於外向偏差行為，有關內向性偏差行為的研究，多為研究者所疏漏。影響青少年內向性偏差行為發生的因素很多，且變項間的關聯亦十分複雜。本研究使用問卷調查所得是橫斷面的片段資料，無法釐清青少年外向性及內向性偏差行為因時間而改變的情形。故建議未來研究可採用固定樣本資料(panel data)，做長期性的追蹤，以更深入了解影響青少年依附關係、參與傳統活動及社會緊張因素與外向性、內向性偏差行為的因果關係。

(五) 本研究係運用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所提供的資料進行分析，雖有省時及降低成本等有利條件，但也受到次級資料分析的限制，諸如個人屬性、特質變數不足，因而無法使用更多元的層面探討青少年外向性及內向性偏差行為的成因。對此，後續研究可納入相關重要變項，如人格特質、社會支持等變項進行分析，如此應可對青少年依附關係、參與傳統活動及社會緊張因素與其外向性及內向性偏差行為間的關聯性有更全面及深入的瞭解。

(作者感謝匿名審查委員所提供的寶貴建議。)

參考文獻

- 王淑女 (1994)。家庭暴力對青少年暴力及犯罪行為的影響。**社區發展季刊**，**68**，191-209。
- 李文傑、吳齊殷 (2004)。青少年暴力行為的連結機制。**臺灣社會學**，**7**，1-46。
- 吳武典 (1992)。偏差行為的診斷與輔導。**現代教育**，**7**(25)，17-26。
- 吳武典 (1995)。偏差行為輔導與個案研究。台北：心理出版社。
- 林朝夫 (1995)。偏差行為輔導與個案研究。台北：心理。
- 周憐嫻 (2001)。學校因素與青少年偏差行為之關係。**應用心理研究**，**11**，93-115。
- 周憐嫻、曹立群 (2007)。犯罪學理論及其實證。台北：五南。
- 侯崇文 (1996)。巨視社會控制、微視社會控制與青少年犯罪。**犯罪學期刊**，**2**，15-48。
- 侯崇文 (2001)。青少年偏差行為：社會控制理論與社會學習理論的整合。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報告。
- 許春金 (1986)。青少年犯罪原因論：社會控制理論之中國研究。桃園：中央警官學校。
- 許春金、孟維德 (1997)。家庭、學校、自我控制與偏差行為。**中央警察大學學報**，**30**，225-256。
- 許春金、馬傳鎮 (1997)。少年偏差行為早年預測之研究（第一年研究）。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委託研究。
- 陳玉書 (1988)。社會連結與女性少年偏差行為—Hirschi 社會控制理論之實証研究。中央警官學校警政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桃園。
- 陳玉書 (2000)。女性犯罪之現況與研究發展。**中央警察大學學報**，**36**，255-276。
- 陳金定 (2008)。青少年親子依附、基本心理需求與羞愧感因果模式之探討。**教育心理學報**，**40**(2)，241-260。
- 陳麗文 (2000)。家庭教育方案研究—非行少年成長團體。中華民國家庭教育學會：家庭教育方案課程規劃與方案推展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 陳毓文 (2000)。安置機構處遇計畫的轉銜。折翼天使的「另類天堂」--兒少安置機構現況與展望研討會，77-88，勵馨社會福利基金會。
- 陳羿足、董旭英 (2002)。探討家庭因素與青少年偏差行為之關聯性--重新思考「家庭氣氛」的測量內涵及建構一個家庭解釋模型的新方向。**教育研究**，**94**，71-87。
- 陳景圓、董旭英 (2006)。家庭、學校及同儕因素與國中聽覺障礙學生偏差行為之關聯性研究。**特殊教育研究學刊**，**30**，181-201。

- 黃德祥 (2008)。青少年心理學—青少年的發展、多樣性、脈絡與應用。台北：心理。
- 葉在庭 (2001)。青少年行為調適、焦慮、社會支持及生活事件與自殺意念的關係。中華輔導學報，10，151-178。
- 鄭瑞隆 (2008，11月)。犯罪少年之家庭支持系統。發表於「200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iminal Problems and Preventive Strategies」，嘉義。
- 趙善如 (2008)。青少年休閒參與及休閒阻礙——以屏東縣為例。台灣社會福利學刊，7(1)，179-223。
- 董旭英 (2003)。一般化緊張理論的實證性檢驗。犯罪學期刊，6(1)，103-128。
- 董旭英、張楓明、李威辰 (2003)。青少年犯罪與偏差行為理論，載於齊力、董旭英 (主編)。台灣青少年偏差行為之剖析，(31-52頁)，嘉義：南華大學教社所。
- 廖經台 (2002)。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家庭因素分析。社會科學學報，1，29-41。
- 蔡德輝、楊士隆 (2006)。犯罪學。台北：五南。
- 謝曜任 (2005)。國小兒童偏差行為與其學校經驗相關之初探研究。高應科大人文社會科學學報，2，249-271。
- 譚子文 (2009)。社會控制理論依附和參與要素之關聯性研究。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13，51-81。
- 劉梅真、黃鈺婷、張明宣、吳齊殷 (2006)。青少年所處環境脈絡對偏差行為之影響。發表於 North American Chinese Sociologists Association Mini-Conference Program, Montreal.
- Agnew, R. (1991). A longitudinal test of social control theory and delinquenc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28(2), 126-156.
- Agnew, R. (1992). Foundation for a general strain theory of crime and delinquency. *Criminology*, 30(1), 47-87.
- Agnew, R. (2001). Building on the foundation of general strain theory: Specifying the types of strain mostly likely to lead to crime and delinquenc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38(4), 319-361.
- Agnew, R. (2006). *Pressured into crime: An overview of general strain theory*. Los Angeles: Roxbury.
- Akers, R. L. (1997). *Criminological theories: Introduction and evaluation*. CA: Roxbury Press.
- Akers, R. L., & Sellers, C. S. (2009). *Criminological theories: Introduction, evaluation, and applic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rnett, O. W., Miller-Perrin, C. L., & Perrin, R. D. (1997). *Family violence across the life-span: An introduc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 Blumenkrantz, D. S., & Tapp, J. T. (1977). Alienation and education: A model for empirical study.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71(2), 104-109.
- Butler, L. D., & Nolen-Hoeksema, S. (1994). Gender differences in responses to depressed mood in a college sample. *Sex Roles*, 30(6), 331-346.
- Cernkovich, S. A., & Giordano, P. C. (1992). School bonding, race, and delinquency. *Criminology*, 30(2), 261-291.
- Cicchetti, D., & Toth, S. L. (1988).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on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disorders. In D. Cicchetti & S. L. Toth (Eds.),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expressions of dysfunction: Vol. 2. Rochester symposium on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 (pp. 1-19).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 Coleman, J. M. (1996).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disorders*. Needham Heights, MA:

Allyn and Bacon.

- Costello, B. J., & Paul, R. V. (1999). Testing control theory and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A reanalysis of the Richmond Youth Project data. *Criminology*, 37(4), 815-842.
- Cretacci, M. A. (2003). Religion and social control: an application of modified social bond on violence. *Criminal Justice Review*, 28(2), 254-277.
- Erickson, E. H. (1968).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Norton.
- Garber, J., Robinson, N. S., & Valentiner, D. (1997). The relation between parenting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 Self-worth as a mediator.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12(1), 12-33.
- Garmezy, N. & Rutter, M. (Eds.). (1983). *Stress, coping and development in children*. New York: Me Graw-Hill.
- Gjerde, P. F. (1995). Alternative pathways to chronic depressive symptoms in young adults: Gender differences in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Child Development*, 66, 1277-1300.
- Gottfredson, M. R., & Hirschi, T. (1990). *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rrero, J., Estevez, E., & Musitu, G. (2006). The relationships of adolescent school-related deviant behavior and victimization with psychological distress: Testing a general model of the mediational role of parents and teachers across groups of gender and age.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9(5), 671-690.
- Hindelang, M. J. (1973). Causes of delinquency: A partial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Social Problems*, 20(4), 471-487.
- Hirschi, T. (1969). *Causes of delinquenc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offmann, J. P., & Miller, A. S. (1998). A latent variable analysis of general strain theory.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Criminology*, 14(1), 83-110.
- Hoge, R. D., Andrews, D. A., & Leschied, A. W. (1996). An investigation of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in a sample of youth offender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 Psychiatry & Allied Disciplines*, 37(4), 419-424.
- Hosley, C. A., & Montemayor, R. (1997). Fathers and adolescents, Lamb. In M. E.(Ed), *The role of the father in child development*,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 Huebner, A. J., & Betts, S. C. (2002). Exploring the utility of social control theory for youth development. *Youth and Society*, 34(2), 123-145.
- Huey, S. J. & Weisz, J. R. (1997). Ego control, ego resiliency, and the five-factor model as predictors of behavioral and emotional problems in clinic-referred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06(3), 404-415.
- Hutchinson, S. L., Chery, K. B., & Sae-Sook, O. (2006). Adolescent coping: Exploring adolescents' leisure-based responses to stress. *Leisure Sciences*, 28 (2), 115-131.
- Kempf, K. L. (1993). The empirical status of Hirschi's control theory. In W. S. Laufer & F. Adler(Eds.), *Advances in criminological theory Vol. 1* (pp. 143-185).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King, C. A., Akiyama, M. M., & Elling, K. A. (1996). Self-perceived competencies and depression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16(1), 192-210.
- Krohn, M. D., & Massey, J. L. (1980). Social control and delinquent behavior: An examination of the elements of the social bond.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1(4), 529-543.

- Le, T. N., Monfared, G., & Stockdale, G. D. (2005). The relationship of school, parent, and peer contextual factors with self-reported delinquency for chinese, cambodian, laotian or mien, and vietnamese youth. *Crime and Delinquency*, 51(2), 192-219.
- Leon, F., John, B., & Kathryn, D. (2006). Young people's leisure contexts and their relation to adult outcomes.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9 (3), 305-327.
- Longshore, D., Chang, E., & Messina, N. (2005). Self-Control and social bonds: A combined control perspective on juvenile offending.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Criminology*, 21(4), 419-437.
- Lyubomirsky, S. & Nolen-Hoeksema, S. (1995). Effects of self-focused rumination on negative thinking and interpersonal problem solv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9(1), 176-190.
- Lyubomirsky, S., Tkach, C., & Robin-DiMatteo, M. (2006).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happiness and self-esteem.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78(3), 363-404.
- Magoon, M. E., & Gary M. I. (2006). Parental modeling, attachment, and supervision as moderators of adolescent gambling.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22(1), 1-22.
- Mahoney, J. L., & Haekah, S. (2000). Leisure activities and adolescent antisocial behavior: The role of structure and social context.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3(2), 113-127.
- Matsueda, R. L. (1989). The dynamics of moral beliefs and minor deviance. *Social Forces*, 68(2), 428-457.
- McCarthy, C. J., Moller, N. P., & Fouladi, R. T. (2001). Continued attachment to parents: Its relationship to affect regulation and perceived stres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in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33(4), 198-213.
- Minor, W. W. (1977). A deterrence-control theory of crime. In R. F. Meier (Ed.), *Theory in criminology: Contemporary views* (pp. 117-137). Beverly Hills, CA: Sage.
- Murray, C., & Greenberg, M. T. (2000). Children's relationships with teachers and bonds with school: An investigation of patterns and correlates in middle childhood.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38 (5), 423-445.
- Paley, B., Conger, R. D., & Harold, G. T. (2000). Parents' affect, adolescent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and adolescent soci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2(3), 761-776.
- Park, H. S., Schepp, K. G., Jang, E. H., & Koo, H. Y. (2006). Predictors of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by gender in South Korea. *Journal of School Health*, 76(5), 181-188.
- Parker, J. S., & Benson, M. J. (2004).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 and adolescent functioning: Self-esteem, substance abuse, and delinquency. *Adolescence*, 39(155), 519-530.
- Pillari, V. (1998). *Human behavior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The developing person in a holistic context* (2nd ed.). Pacific Grove: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 Robins, R. W., John, O. P., Caspi, A., Moffitt, T. E., & Stouthamer-Loeber, M. (1996). Resilient, overcontrolled, and undercontrolled boys: Three replicable personality typ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0(1), 157-171.
- Rudolph, K. D., & Clark, A. G. (2001). Conceptions of relationships in children with depressive and aggressive symptoms: Social-cognitive distortion or reality? *Journal*

-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29(1), 41-56.
- Short, J. F., Rivera, R., & Tennyson, R. A. (1965). Perceived opportunities, gang membership, and delinquen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0(1), 56-67.
- Simons, R. L., Wu, C., Conger, R. D., & Lorenz, F. O. (1994). Two routes to delinquency: Differences between early and late starters in the impact of parenting and deviant peers. *Criminology*, 32(2), 247-276.
- Thornberry, T. P. (1997). *Developmental theories of crime and delinquenc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Tung, Yuk-Ying. (2001). *Factors related to adolescent violent behavior in Taiwan: Testing general strain theory*. 2001 American Society Criminology Conference, Atlanta.
- Vachon, J., Frank, V., Brigitte, W., & Richard, E. T. (2004). Adolescent gambling: Relationships with parent gambling and parenting practices. *Psychology of Addictive Behaviors*, 18(4), 398.
- West, P., & Sweeting, H. (2003). Fifteen, female and stressed: Changing patterns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over time.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4(3), 399-411.
- Wiatrowski, M. D., & Anderson, K. L. (1987). The dimensionality of the social bond.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Criminology*, 3(1), 65-81.
- Wilburn, V. R., & Smith, D. E. (2005). Stress, self-esteem, and suicidal ideation in late adolescents. *Adolescence*, 40(157), 33-45.
- Wong, S. (2005). The effects of adolescent activities on delinquency: A differential involvement approach. *Journal of Youth & Adolescence*, 34(4), 321-333.

The Relationship among Attachment, Involvement, Social Strain and Taiwa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Delinquency

Tzyy-Wen Tan Shu-Ching Fa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attachment”, “involvement” and “strain theory”. The study sample consisted of 10,658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TEPS). Nested regression model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collected data.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reveal: (1) the same influence factor has the effects on external and internal deviation behavior; (2) The general strain theory, compared to the social control theory, can better explain Taiwanese young peoples' deviation behavior, and moreover the external deviation behavior; (3) The male adolescents are more likely to exhibit the external deviation behavior. Furthermore, the female adolescents incline to have the internal deviation behavior.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guidance and further studies are also provided.

Keywords: Attachment, Involvement, Social strain factors, Delinquency, TEPS

Tzyy-Wen Ta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Pingtung County Police Bureau (tantzyywen@hotmail.com)
Shu-Ching Fa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Taiw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Doctorial Student